



理性与效率： 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

晋洪涛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理性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

晋洪涛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 / 晋洪涛著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4

（华村一家丛书）

ISBN 978-7-109-17602-7

I. ①理… II. ①晋… III. ①农户—粮食作物—农业生产—研究—中国 IV. ①F32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2320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姚 红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mm×960mm 1/16 印张：16

字数：300 千字

定价：4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研究得到以下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农户粮食生产行为与效率研究：与消费、劳动力供给的联立考察（U1204707）

中国农村金融失灵市场的内在根源及福利影响研究（71273171）

农户投资行为及内在机理研究（71073102）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理性、目标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20110073110025）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建设中原经济区背景下稳定和提高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政策研究

（2012GGJS-051）

本书出版得到以下机构资助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顾海英工作室

河南农业大学农业政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华村一家丛书》总序

华 村 一 家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由山河湖海分割的地球似乎一下子变了个样，无论是东西的黑夜与白昼，还是南北的酷暑与严寒，自然的区分与障碍似乎都已被科技进步穿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村庄时代，人们形象地称这个时代为“地球村时代”。

在这个地球村中，居住在东部的华夏人，在上天赋予的极为有限的生存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文明。尽管在整个五千余年文明史中，他们时有分合，但渴望统一的华夏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从而找到了彼此交流与沟通的“语言桥梁”。在“车同轨，书同文”的规制下华夏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华大家庭：中国。生活在这个大家庭的华夏人普遍认同“天下华人是一家”，这已成为生长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生命中所固有的特征。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先生的一曲《我的中国心》把全球华人聚合在一起，好似全球一家。从此每逢此节，不论身处何处，华夏儿女都会回到这个家庭，从而形成非常有特色的“华村一家”。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华夏文明已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变，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依旧在传承，在发扬光大。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强力推进过程中，城乡融合，“华村一家”，特色尽显。

团 队 形 成

作为“华村一家”的子民，我们有义务也有必要对生活在这个大家

庭中的成员行为进行研究，由此我们成立了“华村一家”研究团队。结合所学与自身能力，我们团队执著于研究华村人家的传统行为及其演变，这一行为可以用三个“传统”来概括：传统居处行为，传统就业行为与传统身份地位。我们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在那时，作为团队的领头人，我还是一名大学在校学生，但受所学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影响，在学习期间就开始了对农家的访问。在那时，我们的访问不叫访问，而是叫实习。四年本科，到农家实习累计半年以上。尽管自己成长于农家，但真正对中国北方农家有所了解还是通过这些实习。大学毕业后尽管直升研究生了，但专业依旧未变，到农家访问的次数越来越多，访问涉及的区域也越来越广，从农家得到的见识也越来越丰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完成正是基于对宁夏银川郊区农家访问的结果。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工作，最初一年即是作为山西省省委农村工作队员到基层农村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有了学生时代的实习经历，对这一年的“三同”工作自感信心十足。我所在的村属于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经过一户户访问了解以及与村干部协商，结合我的工作单位山西农科院的优势，我们采用更新农作物品种策略，实施了农作物产量倍增计划。实施之初遇到了重重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村民缺少购买良种的资金，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实现了当家品种的全部更新，当年该村的玉米、大豆以及次年的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均实现了倍增计划。朴实的屯留县河头村人，对我们的努力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对我们这些他们心目中的“公家人”给予了最好的招待。我们一天一家到各户轮着吃饭时，尽管各家的饭餐都不同，有的丰盛，有的简单，但对于每一户人家来说，他们都拿出了自家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都是在用心敬我们。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什么是庄稼人的质朴，庄稼人期望的“公家人”是什么样子，党的富民政策应当定位在何处，公家人应如何把党的富民政策贯彻到庄稼人心里。

有了学生期间的农家实习，有了工作头年的“三同”生活，便深感

研究中国“传统与变迁”意义重大。所以在接下来的20年“三农”问题研究与教学工作中，着力打造“华村一家”团队就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团队的建设构想起源于20世纪末我在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业的完成，博士论文的选题即是《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真正开始建设则是我进浙江大学做博士后的事。尽管那时的我还只是浙江大学一名准工作人员，但在开明教授黄祖辉先生的支持下，临时组团开展的中国农户研究事业已初露端倪。2001年博士后出站正式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团队建设就成为此时我的当务之急。我深知团队建设的核心是人，可在研究所工作多年的我，只是对研究所的团队建设比较了解。研究所的团队建设有相对固定的人员组合，而大学则不同，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其研究团队的建设除了有相对固定的几名合作者外，更多的是来来去去的学生。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如一座兵营，有铁打的江山，但没有铁打的兵，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学风建设。正是基于此认识，“华村一家”团队从最初组团开始就狠抓学风，以兴趣培养为核心，以能力考核为手段，以事业进取为目标，着力打造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

自2002年组建以来，团队在我的带领下，以上海交通大学强大的经济管理学科做后盾，以做强做精为目标，通过自身在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研的优势与人脉，与学科组顾海英教授、于冷教授一道合作，于2003年底以跨越式的思维完成“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点的成功申报。2004年正式开始了交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生招生与培养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团队建设正式进入了一个里程碑时代。鉴于我们的业绩，“华村一家”研究团队于2012年荣获上海交通大学首届“十佳科研团队”称号。

团 队 绩 效

人才培养绩效 截至2012年底，“华村一家”团队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2名、博士研究生6名，目前在校硕博研究生8名。总体上看，

团队的研究生培养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业绩非常突出。

在已毕业的几名博士中，程名望同学为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开了两个先河，一是率先在国内经济管理顶尖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二是率先代表交通大学文科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徐翠萍同学不仅在国内经济管理顶尖刊物《管理世界》和农业经济管理顶尖刊物《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论文，更在国际农业经济领域顶尖刊物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SCI&SCI) 发表论文。晋洪涛同学同样在国内顶尖经济管理刊物《管理世界》和《中国农村经济》发表论文。俞宁同学在国际经济学顶尖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Economics Letters* (SSCI)、*Economic Theory* (SSCI) 发表论文，是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首个在国际经济学顶尖刊物发文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业绩突出不只表现在论文撰写上，还表现在项目研究与获奖上。在项目申请方面，四位研究生除俞宁外在校期间全部获得上海市科委博士生论文研究资助，其中徐翠萍和晋洪涛两位同学还获得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养基金资助，晋洪涛同学在校期间还以在职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一项。在成果获奖方面，程名望同学除了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外，其在《经济研究》(2006) 上发表的一文还于 2008 年获农业经济学科大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又名“杜润生奖”)，与我合作完成的专著《长三角农家行为变迁：1986—2005》(上海三联书店，2007) 于 2008 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程名望、徐翠萍与我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农业新政策变化的政策效应》(《中国人口科学》，2007) 于 2008 年获得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晋洪涛、卓建伟与我合作完成的论文《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上海 7 村调查》(《管理世界》，2011) 于 2012 年获得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他们参与的数项成果还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一、二、三等奖数个。可见，团队的研究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项目研究绩效 一个团队的形成与持续发展，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项

目支撑。“华村一家”团队正是得力于国家两大基金的持续支持才得以良好健康发展。从组团以来，“华村一家”团队先后申请并获批项目30项，而国家两大基金项目是核心，也是支持团队稳步发展的基础。国家自然基金项目9项，其中面上项目5项、应急项目3项、地区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一般项目2项、艺术专项1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8项；校级项目5项（包括两个博士研究生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基金）。

团队在前进过程中，不只重视项目的申报，更重视项目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论文、专著以及研究报告的形式不断向社会公布。团队建立以来，先后出版专著10余部，在国内顶尖经济管理类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经济研究》与《管理世界》10余篇，《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问题》30余篇。论著的转载引用与获奖频度也非常突出，先后有10余篇（部）获得不同层次的优秀奖，其中两部（篇）于2008年获农业经济学科大奖（杜润生奖），两部专著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一部专著于2011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随着团队研究水平的提高，论文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2010—2012年连续有4篇SSCI&SCI类高档论文发表。由团队负责人主持的数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基金委后评估中均被评为“优”。团队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艺术专项也被评为“优秀”，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得到社会认可的同时，还得到政府的认可，有10余个成果被政府授予科技进步奖与决策咨询奖，一个成果（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千村万户调查报告，2012）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直接批复。显然，团队的做精做强目标已初步得到充分实现。

团队发展经验 如果说团队在经历短短十年能有这一进步，一个重要原因是团队发展的基础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民行为，对不同层面农民行为数据的积累就成为团队不断超越自我的一

个重要法宝。尽管我们的起家是依靠国家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数据的支持，但实现我们不断超越之梦想的却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日积月累的农民行为田野调查数据。从 2002 年开始，团队就非常注重田野调查，每年要花大量时间与经费用于田野调查，学生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充分锻炼，对研究对象有了一个充分了解。截至 2012 年，团队累计已获得农家样本数据 10 余万份，我们的论著与成果形成很大程度是依托这些调查数据。当然，拥有丰富的资料是实现成果创新的基础，但别样的人才培养制度才是提升成果档次的根本。团队的人才培养思路是：因人而异，有教无类。在人才培养与项目完成之间，团队优先培养人才。通过对学生兴趣发掘，顺着他们的兴趣找到支撑他们发展的研究方向，然后全力支持他们的发展。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耽搁项目的完成，但也正因为有此担心，我们的项目申请思路也相应做了调整，申请的项目实质是已完成的成果。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项目成果的质量，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实践也肯定了我们的这一做法（项目研究成果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双高）。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使学生在团队做研究的压力大大减弱，而研究兴趣则大大增强，由此研究成果呈现一种不断提升的状态。

当然，一个研究团队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它存在的环境，“华村一家”研究团队也一样。它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得益于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良好的研究氛围，其次得益于精诚团结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三农”组合（学界形象地将研究农村问题见长的顾海英教授、研究农业标准化问题见长的于冷教授与研究农民问题见长的史清华教授称为“安泰三农”）。如果说研究团队的话，我们仅是一个小团队，真正的交通大学农经研究团队应是“安泰三农”团队。“华村一家”团队的强劲发展，说到底是一个天地人和的发展。这里的“天”指的是国家对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地”指的是学校与学院两级对我们“三农”组合的支持与“三农”组合的精诚合作；“人”指的是团队特色的人才培养思路与学生的努力进取，三者缺一不可。

品 牌 确 立

随着团队的发展，我们日益感觉到确立一个品牌非常有必要。尽管我们的产品类型多样，有学生、有论文、有专著，还有研究报告，用一个品牌向外推介有难处，但对于个别产品诸如专著，则便于收集，方便读者查询。故从晋洪涛博士论文的出版开始，不论未来在哪一家出版社出版，团队成员的专著均以“华村一家”作为品牌出版。对于已出版的专著，我们将名录附后，供读者查询与参考。



写于上海市闵行区好第坊

2013年3月

序

在我的鼓励下，晋洪涛同学的博士论文《理性与效率：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研究》就要出版了。出版社的一校清样放在案头，再一次阅后似乎较学位申请之时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尽管清样到来与学位答辩时间相隔也就半年，但仍有一种久别之新鲜感。细细想来，这一感觉可能与其师兄程名望博士的论文刚刚出版有关。程名望同学是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独立带的首位博士研究生，毕业已五年有余，我一再催促他将论文出版，但迟至2012年才最终实现。由于论文出版期间正赶上他赴美进修，作为导师的我便主动承担了论文出版的最后审阅工作，五年前的论文在今日读来仍有新鲜感，仍有时代味，足见上海市政府给其颁发优秀学位论文之慧眼。受其影响，再次审阅晋洪涛同学的论文，有新鲜感也就顺理成章。也许读者会说，“你这是老王卖瓜”，对此我不能给出回答，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视角不同，站位不同，自然对他们的专著评价也就有差异。到底我卖的瓜如何，还请学者给予真知灼见的评价。

就选题看，晋洪涛同学的论文选题是农经学者最为关注也最为常见的问题。有关中国农民粮食经营行为，不仅今天的国人关注，过去的国人也非常关注；不仅学者们关注，决策者更关注。要知道，粮食问题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生存与安定，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大型国家，粮食问题的自给化程度实在是决策者最为头痛的大事。由此，农民粮食生产行为的动机到底如何，不仅是决策者最想知道的问题，也是决策过程中最为有用的选题。真正要把此问题搞得清，写的明，就具有巨大的挑战性。关于理性与效率问题，国内外的大家都在探讨，留下诸多经典供世人研读。在这些经典中有直接针对农民行为的研究，诸如恰

亚诺夫 (A. В. чаянов)、舒尔茨 (Theodore W. Schultz)、黄宗智、斯科特 (James C. Scott)、波普金 (Samuel L. Popkin) 等, 也有间接针对农民行为的研究, 诸如西蒙 (Herbert A. Simon)、贝克尔 (Gray S. Becker)、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阿罗 (Kenneth J. Arrow) 等。有直接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的, 也有从社会学、历史学角度出发研究的。他们中有多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可见研究水平之高, 研究难度之大, 拓展空间之窄。

就晋洪涛同学的资质而言, 选择这一主题极具挑战性。^① 最具挑战的就是浩如烟海的文献疏理。能把有关农民行为的理性论述进行全面细致的疏理本身就十分困难, 更不用说还要对此进行评述。基于此, 我对洪涛同学的博士论文能否做出明显创新, 说心里话未抱多大希望。事实上, 也因自己的经济学功底实在太薄弱^②, 对这一领域了解也实在太有限, 不敢过高奢望。但实践的结果却让我有意外收获之感。这正印证了一句俗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只要自己铁了心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功的。一个人的天资聪颖的确很重要, 但也只能在他的成功中贡献 1%, 而一个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心无旁骛的人, 其成功的 99% 来自他的勤奋。洪涛同学正是站位正确, 勤奋有加, 才在诸多前辈的肩上创出一片天地。尽管他的论文创新不在农民行为理性与效率的理论方面,

① 在博士生招生时, 他的分数排位第七, 没有任何优势, 本科和研究生就读学校河南农业大学农经专业在国内排名中等, 竞争力有限, 他本人年龄偏大同样在学弟学妹间没有优势,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进入我的视野。可偏偏遇到我这样一位导师, 在选材中关注点与他人不同, 考分高低、背景如何固然重要, 但考研动机与志向更加重要。我要的是做事业的研究生, 对研究感兴趣, 有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之准备, 洪涛同学在面试时将这一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 10 多位报考我的研究生中脱颖而出。尽管在做决定时, 我有过担心, 参与面试的同事也给予了提示, 最后还是选择了赌一把。

② 确切地说, 我没有上过经济学课。在大学, 尽管我读的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但所开设课程中没有一门真正的经济学, 只有一门貌似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课。到读研究生期间, 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尽管有所提高, 农经专业的学生开始接触经济学, 但也仅是被简编了的《西方经济学》, 原汁原味的《经济学》从来没有读过。当然, 从教后有机会读, 但也因这事那事, 很少系统地研读。

而在实证应用方面，但就此也足以说明，他在这方面是下了一定功夫的，有了一定积累的，对此我是心知肚明。

从他进校的第一篇博弈论课程习作《中国征地制度：现有缺陷与改革方向——基于讨价还价博弈的分析》开始，我就再三对他讲，论文写作是一个典型的“修楼房”过程，其间如何配置各个部件，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规律。文献综述就是要把前人在你所选择的研究领域所做的努力用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既要找到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也要找出他们之间的矛盾与不足，从而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开拓留出空间。在此文中，他谈到了纳什（John F. Nash）对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贡献，也谈到了罗宾斯坦（Mark Rubinstein）对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贡献，但在二人之间显然缺乏一个过渡的桥梁。在论文修订过程中，我提出如何过渡，是谁帮助过渡的问题。洪涛同学经过文献查阅最后发现，斯塔尔（Ingolf Ståhl）正是这一桥梁。从这一习作开始，洪涛同学开始重视文献间的逻辑关系，找到了文献阅读的奥妙与乐趣。也正是这一习作帮助他打开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大门。尽管此文的完成与发表相距三年有余，多次被主编拿下，但在我的支持与鼓励下，最终被国内农业经济最好的期刊之一《中国农村经济》录用刊载。^①

尽管之后洪涛同学的博士论文选题偏离了农村土地制度，但这一研究为他成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变迁和程序公平视角的征地制度改革研究（10CGL048）”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论文选题由最初的农村土地制度转向农民营粮行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篇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的文章迟迟得不到主编认可而迟迟不能发表下的一个逃避或妥协，当然也是我支持或纵容下的结果。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一个来自中国人口大省河南的学生，应当以探讨自己最熟悉的家乡问题为核心。而对于洪涛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他家乡的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作

^① 发表时，编辑部又给出了中肯的修订意见，经过修改与完善，最终以“谈判权、程序公平与征地制度改革”为题发表。

为农业经济方向的学生，选择与自己家乡农民生活有关也与国家社会稳定有关的主题应成为他博士论文的首选目标。河南这一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同时也是中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①，在有限的农地资源支撑下，依靠一家一户典型的小农经营模式，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一亿人的生活问题，同时还将部分粮食输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应有贡献。若能以河南为例把农民的粮食生产行为搞清楚，那对中国粮食生产与安全决策的贡献将是巨大的，这比探讨农村征地制度意义不知要大多少。这也是我带研究生以来梦想要做的事，借洪涛同学之手来完成自己的梦想也是我的一个最好选择。

说实在话，一想到河南，便想起冯小刚先生拍的电影《1942》，一个能将1亿人都养活得好好的河南，为何在70年前连3000万河南人都养活不了？灾民的逃荒惨景一直停留在我的心中久久不能散去。我们也许会说是上天对子民的一种惩罚，也许会说那是腐败的国民政府一种不作为的结果。可对照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又该如何去评说？天灾的确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可改革开放后河南难道就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灾难？随着河南人口一天天增多，由改革开放初的7000万人（1982）升到目前的1亿人（2010），但是他们不仅生活质量没有下降，没有出现生存问题，反而由温饱跨进小康，这一奇迹的产生难道不正是一个河南学生最应当探讨的问题？除此之外，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人地矛盾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河南更加趋紧，而河南在解决好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问题的同时，还对其他省份贡献出自己的粮食，单就此开展博士论文的探讨就是一个好的主题，就能够有所创新。

^① 据2010年人口普查，河南户籍人口高达1.0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80%，比处于第二位的山东份额高出0.66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其在全国人口的份额尽管下降了0.07个百分点（7.87%），但依然保持着第一的位置。2010年河南粮食总产5437.10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95%，比处于第二位的黑龙江高出0.78个百分点，保住了自己10年来的第一位置。与2000年相比，其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份额上升了1.08个百分点（4101.50万吨，8.87%）。但2011—2012年却被异军突起的黑龙江超越。这一超越是否意味着小规模家庭粮食经营模式将被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取代？家庭小规模经营模式在效率方面出了问题？它的营粮动机是否发生了改变？

当然，关注河南这一中国第一大粮仓还有一个特别意义，那就是一家一户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到底还有没有出路，还有多大出路，能否继续支撑中国朝前走？

洪涛同学的选题确定正是考虑了这些问题，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河南入手，在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河南 16 村 1 000 户固定跟踪观察的农村与农家资料，来分析农户粮食生产行为。作者首先从农民理性问题分析开始，提出了“农业外部兼业度与农户收入水平之间呈倒 U 关系”和“农业内部兼业度与农户收入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两个假设，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新的理性分析框架：家庭经济周期理性模型，按照收入水平将农户家庭发展周期划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将各阶段农户的理性表现分别确定为生存理性、生活理性、收入理性和经济理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理性表现下农户的行为目标和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利用典型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现金收入最大化已成为当前农户家庭的行为目标。在现金收入最大化目标下，农户粮食生产已从产量最大化转向“自给型”生产——满足家庭口粮所需，家庭粮食安全也由自我防范转向市场保障。接着，作者对农户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之间的制约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农户的粮食生产决策可以独立并先于消费决策进行，劳动和粮食相对价格变化明显影响农户粮食生产和消费决策；追求现金收入最大化的农户开始大幅减少粮食生产的劳动投入，之所以近年来实现了粮食的稳产增产，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下的单产水平提高；受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农户的口粮消费出现大幅下降；农户将家庭粮食安全由自我防范推向市场保障，家庭粮食收支平衡已经趋向脆弱。作者又从家庭劳动力分配角度研究了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发现：在当前“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在家”的新家庭分工模式下，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家庭农业生产劳动；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女性支配时间的自由度显著增大，而劳动和粮食相对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农

户家庭以及妇女的时间配置；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非农化呈现加剧态势。最后，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视角对农户粮食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种植规模对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粮食作物的生产效率确实均有影响，但影响方向并不一致。

作者的这一分析对中国政府在传统农区制定粮食政策时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这可以从本书的政策建议中得到确证：第一，农民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政府在制定粮食政策时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相信农民智慧；第二，在当前阶段，农民的行为理性表现为现金收入最大化，政府制定粮食政策时必须考虑农民的致富愿望；第三，由于粮食相对价格的下降，现金收入最大化理性指导下的农户开始将家庭粮食安全由自我防范推向市场保障，“自给化”成为当前农户粮食生产的基本特征，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农户家庭资源配置表现出典型的非农化趋势；第四，农户粮食生产目标和政府粮食安全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农户而言，实现政府粮食安全目标的土地生产率与实现农民增收目标的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政府在制定粮食政策时需要实施分类指导。

通过再次审读书稿，可以说晋洪涛同学的论文在思维方式上给我们带来一个创新。记得我在给学生们上课时曾讲到：“不是我们的农民不行、不能与不会，而是缺乏让他们行、让他们能、让他们会的各种环境”，“要相信他们，也只有相信他们，我们的农业才有出路，我们的农村才会改善，我们的农民才能富裕”。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否则，《1942》会再次发生，三年自然灾害会再次降临。

事实上，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事先要对所做有所思有所想。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综合能力，而能使目标实现的惟有农民。即使科技能力很高，离开农民照样不行。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悟性，教师再有能耐，如果不把学生的悟性开通，即使再聪明的学生也做不出像样的论文。晋洪涛同学作为“华村一家”团队的成员，尽管其资质不是最优，